

楚辞通论

黄震云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楚辞学的著作。作者从中华文明一体化的研究思想出发，广泛利用典籍文献，以当代文学理论为武器，从历史文献和文化美学等多元视角系统地论述了诗、辞、赋的关系；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原因；作家世系、生平事迹、著述过程、风格贡献；每一篇作品的写作时间、地点、布局、用心、本事、成就；探讨了楚辞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象、文学史意义及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命运与原因，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等。对离骚的写作时地、屈原三次放逐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皆有突破；对历代尤其当代楚辞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某些主观阿世的方法和学风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批评。

序

陈贻焯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化名人，因此，屈原在中国，而《楚辞》研究却是世界的。屈骚以其文本丰富的内涵和独创的艺术建构以及高洁的人格力量影响着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作家，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相比。在世纪之交，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屈骚所表现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给我们以力量和希望，对于参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认识《楚辞》，以新的高度去揭示其本质规律，发展祖国文化事业，丰富我们多元社会下的精神生活就成为学术界十分重要的迫切的任务之一。

当代楚辞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在深入和拓展方面，抑或是著述的量的积累，都为前所未有的，成绩卓著，始终保持着显学的地位。要想在《楚辞》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就显得特别困难。尤其是出于种种原因，一些著述或多或少地在占有资料，思考深度，理论方法等方面显得不足，还有枝蔓、偏离等现象的存在，猎奇而图省事的做法也不是没有。中青年学者群中因此卓然成家的十分少见，未免让人有些焦灼和盼望。

黄震云先生将出版其论著若干，将《楚辞通论》寄来，嘱余为序。余得以拜读，喜其资料详尽，剖析入微，洵佳构也。若《离骚的写作时地和屈原三次放逐》诸篇，多发前人所未发。总之，如作者后记所云，是广泛利用古代典籍文献，以当代文学理论为武器，潜心思考，深入研究，依靠长期积累写成。藉以清理已成之研究成果，把楚辞学研究提升到新的历史水平上。”其余论述诸

篇之特点，总亦大致如此，故不缕述。黄先生尚年轻，百尺竿头当更有胜于今昔者。余拭目以待，观其成。

是为序。

于北京大学梅棣璜

1996 年 11 月

目 录

序	陈貽焮	1
第一章 《楚辞》名称论		1
第一节 《楚辞》名称解析		1
第二节 《离骚》名称解析		9
第三节 《九歌》、《天问》、《九章》等名称解析		15
第二章 《楚辞》作家论		23
第一节 屈原世系考		23
第二节 屈原生平考		33
第三节 宋玉生平考		45
第三章 《楚辞》作品论		49
第一节 概 论		49
第二节 《离骚》论		56
第三节 《天问》论		104
第四节 《九歌》论		123
第五节 《九章》论		160
第六节 《卜居》、《渔父》论		193
第七节 《招魂》、《九辩》论		199
第四章 《楚辞》意象论		220
第一节 政治理想意象		221
第二节 人格精神意象		230
第三节 心语寄托意象		235
第四节 文化风尚意象		240
第五节 审美心理意象		247
第五章 《楚辞》影响论		251

第一节	《楚辞》和两汉文化	251
第二节	《七发》与《楚辞》	265
第三节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278
第四节	李白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305
第六章	楚辞学研究论	314
第一节	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314
第二节	楚辞学研究的特点	320
第三节	楚辞学科思想方法的讨论	322
第四节	楚辞学研究的成就	325
第五节	当代楚辞学研究存在问题	331
第六节	国外楚辞学研究	333
后 记		338

第一章 《楚辞》名称论

第一节 《楚辞》名称解析

在汉代的史书中，我们已经多次见到了楚辞的名称。司马迁《史记》卷122《酷吏传》说：“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检班固《汉书》卷64《朱买臣传》云：“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又《汉书》卷64《王褒传》云：“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等待诏金马门。”由这几条材料我们看出，楚辞的名称至少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形成，连家贫的朱买臣皆能阅读谈说，可见不是什么僻书，只是“六艺群书”中的一种罢了。因此，我们应该给楚辞加上书名号，为《楚辞》，现今把《楚辞》当成一个名词，不看作书的一种是不合实际的。

就像《诗经》又称为《三百篇》、《诗》、《周诗》一样，《楚辞》也有一些别称，如屈赋、骚赋、楚赋、骚等等，似乎和汉赋混淆起来了。究其原因，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他“乃作《怀沙》之赋”。又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设“诗赋

略”，也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好辞又以赋见称，可见在汉人眼中，辞和赋有联系，也有区别。那么，区别和联系究竟在哪里呢？《诗经》、《楚辞》、《汉赋》的名称都出现在汉代，从形式上看不出多少特别，似乎带有些随意或约定俗成的意味。实际上包含着汉代人对三种时代文学的时代评价，体现了汉代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方式。

在先秦时代的典籍中，谈《诗》、用《诗》十分普遍。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就称“《诗》以言志”。志是潜在的诗，《诗》言志是对诗智慧方式的功能阐发和创作过程的逆向概括。《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言“《诗》言是，其志也。”还有较早的《尚书》等，提法大致相近。在《论语》中，孔子也十分重视《诗》的功能和地位，认为完成道德修养的过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有政治功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诗》看成是从政的纲纪和规范。还提出了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强调“小子何莫学乎《诗》？”至少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但没有说什么是《诗》。直到孟子才有一个明朗的说法：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由此可见，《诗》是关于王者之迹的，是特定时代的文献，某种意义上是周王朝的自然历史进程的智慧方式，是可以纲纪天下的经典，所以孔子和诸子皆敬之有加。子曰当然不能敌于《诗》云，这在孟子之前已经确立了。因此人们考虑的是如何学习、掌握和应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文体学习或文学创作。为什么《诗》亡而《春秋》作，或以为与文体容量有关，不是没有道理，但未能概全。春秋以后，或者说“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孔子伤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褒贬。”^①使乱臣贼子惧。如果从

① 《虞东学诗》卷首《诗说》。

文体上去解释，显然是不够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专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惻隐古《诗》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班固的意见代表了汉代人对于诗、辞、赋的普遍认识水平。《诗》是周王朝的声音和风俗载体，是周王朝的象征。因此周衰则诗道浸坏，就没有诗人，当然也就没有诗了。也因此从战国到汉代无法别贤与不肖，战国“无义战”，此时的文坛没有诗人，就是诗样的作品也不可以称为诗。屈原所作不能叫诗，只能叫辞，他只能是辞人而不是诗人，楚国的作品就叫做《楚辞》。我们现在看到的《楚辞》是屈原以及宋玉之徒在楚国衰微，政治昏暗，人文精神颓丧的一段历史时期抒情言志的新诗，主要是屈原反映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以及生活处境的作品，不是楚国文学全部，也不是楚诗的全部。汉代的诗一般称为语、谚、歌、谣、辞之类。班固把屈原的作品看作是贤人失志之作，仅仅是“惻隐古诗之义”。和班固的看法相似，扬雄、司马迁还有更细密的划分。他们既认为《诗》以后无诗，但也并没有把屈原的作品和汉代的赋混为一谈，而是从教六诗的角度提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班固《汉书·扬雄传》说：“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扬雄好辞、赋，可见二者不是一回事，而屈原文过相如，则表明辞之胜于赋也。他写作了《反离骚》之类的作品以祭屈原，到后来甚至封笔，

对写作汉大赋不屑一顾。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称《离骚》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点。屈原死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已无诗人之心，所以写出来的作品不能叫辞，是“好辞以赋见称”。这个赋不能感物造专材知深美，而只是诵或颂。宋玉和汉赋具有密切的关系。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以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是作赋之迹”。“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外传”。指出赋之重物质形态，不强调心质之抒发，悲怨之思绪的主张。这一方面体现了汉代人对赋的看法，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屈原作辞，疏放迁逐，乃至投水自杀。汉武帝时，“虽辅弼股肱之臣，也不过质明趋朝，鞠躬屏息，扃笏奏事，卑卑而前，数语即退。”^① 自枚乘借楚太子疾开汉赋劝谕风气以来，《子虚》、《上林》、《甘泉》、《羽猎》诸赋无不有美刺表现，但都适可而止，曲意呈志。汉武帝时代大赋最为盛行，但天子已无用赋自考正之意，臣下当然也不会自逆圣意寻求放逐，走向死地。

早在公元前196年，西汉政权初建时就发生了一系列文武、吏治、文道关系的争论与变化。从公元前200年冬10月长乐宫建成，叔孙通演示礼仪，刘邦从安事《诗》、《书》到“今日方知皇帝之贵”，以及公元前195年完成了定律令、军法、章辞，设誓藏金以后，统治者明确地提出“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以冠德于百王”。（《汉书》卷100）把周代的《诗》、《书》、《礼》以及《春秋》等推到典谟的位置上。刘邦打下天下后要设都洛阳“与周比隆”。这样的做法是“与周比隆”的行为的具体操作或全面启动。

刘邦及其丰沛集团原系东夷，属于徐夷或淮夷，后合为淮夷。周王朝借助东夷打败淮夷以后，淮夷便大量吸收了吴越、楚、齐鲁文化的因素，形成特殊的品格。他们仰慕周文化的恢宏和系统，又要凌驾于周王朝之上，今文经学由此发生拓展。由于他们曾经

① 《文献通考》。

属于楚地，所以对楚文化又有着特别的心理定势与热情。因此精神体系上充满了矛盾，彼此缠绕胶着。汉代对于《诗》、《楚辞》的态度体现了这种文化渊源关系。至于为什么称为经典，也有其特定的理由。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卷2中说：

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

由于汉儒们把《诗》、《书》等周代文献看成是常道，而道就是经，所以把《诗》称为《诗经》。据《韩诗外传》卷5，孔子和子夏曾进行过关于《关雎》的讨论。孔子认为，《关雎》关于天地的道德牢笼，是“生民之属，王道之原”，是六经之策的综结和根本。《韩诗外传》卷5还指出：“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他，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表明六经是道，不易之术，那么作为王道之原的《诗》当然是排在六经之首了。六经和六艺有时会混而为一，原因在于，六经是盖其思想内容，六艺则指传授与社会职能，视角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屈原的作品再好，其心可与日月争辉，也是无法与《诗》争地位了。

对于《诗》、《骚》、赋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指出，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在刘勰看来，赋不能歌唱，只是朗诵，是《诗经》的一个支派，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一类，但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了《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样式，所以赋起源于《诗经》，发展于《楚辞》，只到荀况的《礼》、《智》以及宋玉的赋，才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刘勰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去比较《诗》、《骚》、赋的关系，大致还是可取的。但他在该书的《辨骚》篇中，把《楚辞》比附六经，把《楚辞》看成是儒家

经典，未免有些牵强。首先，他认为“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虽然他承认《离骚》之杰出，楚文化的地位，但偏言去圣未远，便削弱了《楚辞》的主体地位。其次指出从汉宣帝开始已不仅仅是爱骚，而是推到了典谟的位置上：“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刘安等“四家举以方经”，只是孟坚谓不合传。刘勰还详细地分析核对了《楚辞》的作品，和六经进行了比划，认为：“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但他同时也指出了许多不同于《诗经》的地方：“至于托云龙，说迁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譌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他主张《楚辞》的地位在《诗》与赋之间：“《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上面我们通过《诗经》、《楚辞》、《汉赋》的命名及其由来的考评，以及对三者地位的分析，刘勰对三种文学作品的讨论已经得出了结论。《楚辞》是屈原、宋玉等人在一度时期内写作的一种新的诗歌，是楚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命名具有文化含义。在汉魏六朝时期虽然王逸、刘勰等人亦称其为经，但地位仍在《诗经》之下，而客观上，二者实是各有所长，难分轩轻。

但是多年来，楚辞学界受黄伯思的观点影响，过分地强调了地域文化的特征，甚至把楚辞看作是地方文学。宋代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把《楚辞》说成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诎、蹇、纷、侘傺者，楚

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蘼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也。”后人对此深信不疑，还有所发挥。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言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文，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①

黄伯思生活在徽宗时代，地域中心论思想十分强烈，所以其见解难免偏执皮相。^②楚语楚声，汉人已不能诵读；楚地楚物，不过是《楚辞》中的一部分。宋代吴仁杰撰有《离骚草木疏》，此书成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自称“独取二十五篇之文，故命曰《离骚草木疏》”。前3卷为芳草嘉木，共44种。第一卷：荪、芙蓉、菊、芝、兰、石兰、蕙、芷、茝、杜蘅、江离（蘼芜）、杜若14种。第二卷：荼、薜荔、女萝、菌、菇、紫、华、菰、蓴、苹、蒿、苴、菱、蘋、胡、绳、芭、蓼茅、揭车、留夷，计20种。以上二卷为草本植物。第三卷：橘、桂、椒、松、柏、辛夷、木兰、莽草、楸、黄棘，计10种，为木本植物。第四卷为恶草：薺、蓼、蓀、艾、茅、萧、葛、篇、芥、栎、篁共11种。这44种植物我们在《诗经》中基本可见到，只是有的名称略有不同。所以从楚地物产上尚不能认可淮北枳式的地方特征。况吴仁杰之说多取自《山海经》等书以证，所以楚物说不能成立。明代的屠本峻撰有《离骚草木疏补》4卷，清代祝德麟又有《吴仁杰离骚草木疏》4卷，祝氏取《永乐大典》、《齐民要术》等书对吴书进行了详细校订，改正450多字，增损250多字。清代周拱辰亦撰有《离骚草木史》共

① 第四编《屈原与宋玉》。

② 据赵与峕《宾退录》页78，黄伯思卒于政和8年。

46 则，亦与前列诸书一样引中原文化典籍为证，既如此，则非独楚之物可知。

清代俞樾《读楚辞》后附有《楚辞人名考》，对《楚辞》中出现的有关名物、制度、史实等进行考辨，对一些字句重加诠释，计 41 条。其中《楚辞人名考》收录考辨《楚辞》和汉人拟作中的人物鬼神名，计古帝王 20 条，古诸侯 24 条，古人 67 条，古妇人 19 条，神 46 条。如古帝王：伏羲、女娲、轩辕、高阳、高辛、尧、舜、禹、启、夏康、少康、桀、汤、武丁、纣、周文、武、昭后、穆王、周幽。这些人物鬼神几乎很少是楚国之人物鬼神。所以说把《楚辞》说成是楚地楚物之作不符合作品实际。黄伯思当然也并没有认真地研究《楚辞》，而只是带有想当然的推测。近人饶宗颐还作有《楚辞地理考》，认为《楚辞》中地名有 6 种情况：1. 泛称之地名，如江南，指大江以南一带。2. 专称之地名，如江南亦为邑名。3. 合称之地名，如鄢郢。4. 别称之地名，如楚徙陈后，鄢郢转指鄢陵和郢陈。5. 借称之地名，如郢代楚都。6. 混称之地名，如边邑地名，多所淆乱。他认为，后来说，多出于附会，一定确指某州某县“必不正确，且亦属无谓。近古之说，但泛言汉、夏之域，虽非定见，究亦有理”。屈原诗作多言其放逐之生活，所涉名物当多在楚地，但由于带有一定的借用或想象，再说他也未必尽悉楚地各处名物，何尝没有随意性，所以饶氏言“亦属无谓”确是有些道理。今人延着黄伯思的思路指出“兮”字为楚语之征，亦是浅陋。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中早已指出：《楚辞》的产生主要受北方文学、南方文学和楚地民俗歌舞、山川地理的影响。他把《诗经》中有“兮”为助词的诗分为八类，然后与《楚辞》中的《天问》、《九歌》、《九章》诸篇详加比较，探索它们的渊源关系，得出《楚辞》不少章句是由《诗经》演化而来的结论。闻一多先生还专门有释兮之文。^①关于兮之说似不必多言。当然，除了作

^① 见《闻一多全集》，单行本《神话与诗》亦已收录。

家的创造以外，文化积淀和时代的自然人文风貌对作品的产生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不能过分强调。据《国语·楚语》，楚人提到《诗经》多称为《周诗》，屈原的作品中一次没有提到《诗经》及风雅之类，可见《楚辞》是具有相对独立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的。

第二节 《离骚》名称解析

《离骚》是《楚辞》的半壁江山，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一直是《楚辞》研究这门显学中探讨的热点。从司马迁《史记》到当代楚辞学界关于《离骚》二字的解法甚多，归纳起来约有10种。

一、离忧

《离骚》就是“离忧”的提法倡自淮南王刘安，司马迁《史记》从其说。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后来的《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朱熹《楚辞集注》、钱澄之《屈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皆从之且略有发挥。今人有不少支持这种解析，如陈元胜认为，司马迁离忧说应解释为“别离之忧愁幽思”，是抒发诗人离别楚王、离别故都、离别旧乡之忧愁幽思。^①

二、别愁（牢骚）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汪瑗《楚辞集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王闿运《楚辞释》、魏炯若《离骚发微》以及陈子展《楚辞直解》皆作如是说。戴震《屈原赋注》认为，“离牢一声之转，离骚犹今人言牢骚。”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认为，“韦昭以牢骚释牢愁，牢骚亦即离骚声转，今常语也，谓心中不平

^① 《中州学刊》1987年3期。

之意。”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詹安泰《离骚笺疏》皆持此论。也有的略有与此不同的观点。如杨柳桥认为，离字有发抒、陈布的意思，所以离骚即是舒忧，陈忧。^①龚维英认为是“陈述自己的忧愁。”^②钮国平以为：“离，去也。骚，犹忧也，愁也。意思是离去不离去的苦恼，也就是去留楚国的苦恼。”^③

三、曲名

游国恩先生《离骚纂义》指出，“牢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者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大招》有云“‘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贺辩》、《劳商》，皆曲名也。”“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楚之古曲，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赞成游先生意见的还有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马茂元《楚辞选》、郭维森《屈原》、张纵逸《屈原与楚辞》、张家英《屈原赋译释》等。1980年11月版《离骚纂义》删去了牢骚说，但仍坚持为曲名。张永鑫提出遭忧——曲名说，^④朱碧莲提出楚民歌乐曲说，^⑤皆延游先生说申述。

四、与愁告别

此说出自钱钟书先生，他在《管锥编》第二册中议论道：“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周致中也说：“（离骚就是）告别、离却我的心烦虑乱。”^⑥

五、离蒲

李嘉言先生说：“骚应解作地名，离骚即是离开蒲骚。”^⑦王廷洽指出，“离骚就是离别故乡，而屈原的故乡是蒲骚，所以《离

① 《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

② 《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3期。

③ 《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3期。

④ 《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3期。

⑤ 《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1期。

⑥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4期。

⑦ 《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5期。

骚》正确的题解就应该是：告别了，蒲骚！”^①

六、多重涵义

李陈玉《楚辞笺注》说：“骚乃文章之名，若离之为解，有隔离、别离、与时乖离三义。”周本淳先生说：“离骚一名，不妨统遭忧、离愁、牢骚之三义。”^②牛龙非说：离与丽通假，都是相连比并之意，离骚当理解为双重乃至多重牢骚。^③

七、忧愁

孙文鑒先生认为《离骚》乃复合词，为忧愁之义。^④游寿认为，“离骚、骚离以及骚、些皆是楚地方言，表示忧烦。”^⑤认为《离骚》之骚音非寻常的还有廖季平。他在《楚辞讲义》中认为，“《离骚》乃秦始皇博士所为《仙真人诗》，谓离即离绝世俗，以骚为逍遥之合音。”陈思苓认为骚是《方言》所释“蹇也”之义，可训为祸难，《离骚》即独受祸难。^⑥

八、离歌

浦江清《祖国十二诗人·屈原》说：“离是离别，骚是歌曲的名称，离骚就是离歌。”刘自齐认为，骚字与现代苗语的声韵调基本一致，离骚就是离别之歌。^⑦张中一说，骚是楚地方言，乃歌曲之意，则离也一定是楚方言，离的本义是楚，《离骚》乃楚歌，是战国时楚国流行的歌曲。^⑧郭祥贵以《尔雅·释乐》“大琴谓之离，释离骚为琴骚，即用琴弹的一首曲子，并认为《离骚》乃楚人固有之琴曲也，抒离别之情。”^⑨台湾有的学者以为离指离鸟，离骚本

① 《艺文志》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② 《活页文史丛刊》第26号。

③ 《江权论坛》1985年5期。

④ 《浙江师院学报》1983年1期。

⑤ 《北方论丛》丛书第3辑《楚辞研究》。

⑥ 《国文月刊》65期。

⑦ 《求索》1983年3期。

⑧ 《屈赋新考》（1986年）。

⑨ 《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4期。